

- 陈诚『研究系』特务活动内幕
- 三峡工程规划、决策的由来
- 半世飘零、半世辛酸的辛亥首义元勋曹珩
- 戴季英的风雨人生
- 江陵西汉男尸出土纪实
- 我所认识的熊十力先生
- 关肃霜的舞台艺术生涯

# 湖北文史

二〇〇六年第二辑（总第八十一辑）

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# 湖 北 文 史

二〇〇六年第二辑

(总第八十一辑)

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**湖 北 文 史(半年刊)**

2006年第2辑(总第81辑)

主办: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出版:(湖北文史)编辑部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路85号

邮编:430071

编辑部电话:(027)87823130(传真)

电子邮箱:hbws1@126.com

印刷:湖北省计委信息中心印刷厂

出版日期:2006年12月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

字数:17.5万字

(2005)湖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2092/SG号

(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)

# 目 录

## 时代追踪

- 陈诚“研究系”特务活动内幕····· 刘庄如(1)  
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历史回顾····· 潘 茂(42)  
三峡工程规划、决策的由来····· 刘思华(48)

## 沧桑看云

- 半世飘零、半世辛酸的辛亥首义元勋曹珩····· 曹 壁(58)  
戴季英的风雨人生····· 苏振兰 夏明星(74)  
一位在异域遭受十八年冤狱的百岁老人····· 钟敬又(92)

## 江汉寻梦

- 江陵西汉男尸出土纪实····· 陈振裕(99)  
我的六年“五七”干校生活····· 何 涛(108)  
“文革”时期,我在武汉上初中····· 李 强(129)  
咸丰南剧····· 吴光元(139)

## 闻人聚焦

- 从政二十余年的夏寿康…………… 许恺景(143)  
我所认识的熊十力先生…………… 阎秉华(147)  
关肃霜的舞台艺术生涯…………… 姚 冷(157)  
韩宁夫与湖北的文博事业…………… 邢西彬(177)

## 名家谈往

- 耿马之行(连载)…………… 陶述曾(186)

刘庄如<sup>①</sup>

## 陈诚“研究系”特务活动内幕

“研究系”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。虽然陈诚矢口否认这个机构，这个机构也极力避免社会上把他们当成为一个特务集团。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大陆解放，以张振国、阮成章、刘庄如为首的一班人，却始终打着陈诚的招牌，从“军统”和“中统”两大特务派系势力的夹缝中，以独树一帜的姿态，立下了自己的门户。他们先后据有九战区、六战区、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、军政部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密情报特务机构，在一定时期内，还控制了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。总之，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，也就是“研究系”人员频繁活动之所。我虽然对“研究系”早期活动情况了解不多，但对其后期的许多活动，我不仅是见证人，也是制造者之一。

### “研究系”特务的缘起和演变

“研究系”的“三头”及其起家 “研究系”的首要人物张振国，原名张汉卿，又叫张英，别号张正之，原籍湖北沔阳，家住歌黎湾，现属于洪湖县境。张振国是中央军校六期、中央警官学校交通班

---

<sup>①</sup> 作者当时系陈诚“研究系”特务组织的重要成员，曾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，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，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，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等职。

一期、陆军大学将官班四期毕业生。1928年在陆军第十三师七十三团三营做过排长。土地革命时期，在江西南昌行营调查课受过谍报训练。抗战初期，张由军令部第二厅派到武汉行营，当过谍报课长。后来依附陈诚做过第九战区长官部情报参谋、第二课课长，第六战区长官部联络组长、通信室主任，以及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，军政部调查室主任和国防部第二厅一司副司长。在一段时期内，他是陈诚帐下红极一时的人物。

张振国上下圆滑，无论什么事都讲究权术，也讲究效果。例如，在远征军时候，宋希濂不买他的帐，他便在陈诚那里用政治情报的手法，使宋希濂丢官失爵。宋也不示弱，利用自己在鄂西地区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的权势，变相地挤走了张振国——当时张振国任湖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查专员。后来张振国利用“鄂人治鄂”来反对“湘人治鄂”，在宋希濂和朱鼎卿（湖北省政府主席）之间制造矛盾，让他们互不相安。由于张振国运用权术欺侮了不少人，最终被陈诚鄙弃而丢官失业。张走后“研究系”的实权落到了阮成章的手中。

阮成章又名阮铁成，湖北红安县人，湖北省第二中学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。抗战初期，考入军委会战干团情报队。内战期间毕业于国防部情报学校高级情报军官队（第一期）。早在抗战初期阮成章就和张振国在武汉情报组打过交道。1939年，阮成章在南岳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。张振国在西南游干班第二期任第五队队长、第三期任第十队队长的时候，阮成章则是第五、第十队的指导员。后来，阮成章跟着张振国由九战区到六战区，直到1942年，还只是一个上尉情报参谋。

阮成章机敏善变，能写会讲，很有工作能力，在湖北恩施地区帮助张振国办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案件。阮成章效忠国民党，更效忠陈诚，即使在日机空袭狂炸时仍不顾死活地工作，曾被日机炸伤

腰部几乎毙命。后虽经医治得救，却始终患一种神经质的疯狂病以及顽固的恶性疟疾。也正由于他亡命效忠，得到陈诚的灵魂人物郭忏的特别赏识，很快升到了研究室情报股长。

1943年，张振国离开六战区随陈诚去远征军任调查室主任后，阮成章被破格提升为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上校代主任。后来，郭忏官升一品，阮成章也高攀一级。在陈诚的势力范围内，先后做了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、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阮成章由恩施飞到武汉参与接收日伪投降时，郭忏又特别向陈诚推荐了阮成章的能干。陈诚在武汉接见阮成章时，阮说：“当前我们只是接收了物资，没有接收人心。”此话很得陈诚的赏识，对他慰勉有加。

后来，陈诚把这两句话作为向蒋介石汇报接收情况的重要内容，他还在南京国防部的纪念周上强调说：“我这次在武汉碰到一个青年（指阮成章），他说‘我们当前的接收，只是接收了物资，没有接收人心’，我看这确是我们当前的病根。”这等于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扬了阮成章，阮从而身价十倍。此后阮成章也就更加效忠蒋介石和陈诚，他每占据一个情报据点，就以郭忏和陈诚的背景，长期控制着那些据点。在张振国失宠于陈诚没落无闻的时候，阮成章就成了研究系的领导中心。他曾自豪地说：“搞情报，像我这样的白手起家，干上了海军总部情报处长，虽然不算造极，也算是登峰；再干，那就只有第二厅厅长，否则难以收手。现在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这末句意味着当时中国每个海港据点都有他的势力存在。

我是湖北咸丰县人，早年和阮成章是湖北武昌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。1944年初进入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，当上了阮成章的助手。后来，通过他的关系结识了张振国，也是一见如故。我先后担任了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副主任、第十一战区研究室主任、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、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、湖北绥靖



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等职,这些与阮成章、张振国的帮助分不开。抗战胜利后,我虽然和阮成章分了手,但许多升官逐鹿的图谋,仍是相互通搭、相互缘引的。所以,我的活动都与“研究室”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。

当年在“研究系”内部,把张振国、阮成章和我三人称做“三头”,而把杨大和(二厅办公室副主任)、陈寄生(武汉稽查处处长)、李铁生(武汉稽查处副处长)、余诚(情报学校处长)、周伯达(海军情报处副处长)、阮更生(昆明稽查处处长)等人呼为“六臂”。我们“三头”、“六臂”在一定时期构成了“研究系”的主要骨干。

“研究系”的政治背景 1945年初,张振国由昆明远征军长官部回到恩施,我和他第一次见面。当时研究室一班人都称他“张先生”,而张振国自己也是以研究室的家长自居。在一次有阮成章、余诚在座的闲谈中,他提到对军统的态度时说:“军统有什么了不起!有关鄂西会战的情报还不是我们的同志抢了头功!戴笠在黄埔路拦住委员长的汽车递情报时候,谁把他放在眼里?只要我们好好干,辞公(陈诚字辞修)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。但在今天,他们不干涉我们,我们也不得罪他们。”

1947年张振国没落失宠的时候,曾带着姨太太陈佩秋住在北平隆福寿崔府夹道24号我家达半年之久。其间,我与他谈到北方处境复杂,情报人员派不进解放区,难以取信上级,“军统”特务到处对我们施加压力,难于应付,希望能够转移地区工作。张振国听后表示:“北平是一个重要据点,在现有基础上会有所作为的。做情报不仅要注意敌人,也要注意自己的长官,更要随时作状况判断。如在抗战前期,我以军令部情报参谋派到九战区服务时,长官(指陈诚)要我派出一个情报组去九江侦察情况。我派了张正大做组长,他们是用‘探子报’的原始方法进行活动,做法十分拙劣,根本找不到情报,也不知什么是需要采集的情报,日本鬼子还未到九

江，他们就溜回武汉了。长官部在撤离武汉时向我要九江方面的情报，我看不好交代，便灵机一动想当然地杜撰说：‘日军进犯田家镇后，一部将溯江而上，另一部则由黄梅经黄陂迁回武汉。’我的这个‘情报’，根本是捏造，但后来居然成了事实。尽管辞公没有按这个‘情报’作出处理，但是由于日军的行动恰巧与‘情报’内容偶合，便引起了辞公对我的重视，后来长官部迁到崇阳，还要我向武汉方向派遣情报组。”张振国在早期取得陈诚的信任，就多用这种手段所致。

1945年7月，在我离开第六战区到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任研究室主任时，阮成章曾和我就研究室的出路问题谈过话，他说：“我们今天羽毛未丰，组织还未定型，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‘军统’对我们的排挤，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，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。因此，我们只有分道扬镳，相互默契，到了有一天，不是我们需要他们，而是他们需要我们。目前，梅公（郭忏号悔吾）是培植我们的，梅公的指示就等于辞公的指示。孙长官（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）也是和辞公同一条政治路线，是会支持我们的。只要我们有成绩，就总有我们出头的一天。”

阮成章这番话充分表明了“研究系”的背景和政治路线，“研究系”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挂名的组织，也正是这个缘故。

从游干班到联络组 以张振国、阮成章和我为首的“研究系”，在选拔任用人才上有一套理论根据。如“人是最宝贵的财富”、“有人就有世界”、“干情报就得一手抓人、一手抓钱”等，且始终贯穿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之中。

当“研究系”活动顺利得势的时候，为了生存和发展，我们懂得培养情报人员才是进行情报活动的基本环节。在九战区长官部由武汉撤到长沙而日军又节节进逼之际，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不了解，常是一筹莫展；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又是分外眼红。为了

开展敌后游击，陈诚在湖南南岳成立了“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”，指定李默庵主持训练。当时，国共合作抗日，初期有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在西南游干班讲授一些技术课程。学生毕业后，有的跟了共产党，有的跟了国民党。

张振国按陈诚旨意，在游干班内部举办了两个谍报队，一是第二期的第五队，一是第三期的第十队。张振国亲自兼队长，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后，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。这两个队是纯情报性质的，学生男女兼收。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，有情报业务、化装术、通信术、侦察术、测绘术、窃盗、交通等课目。这批学生毕业后，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，其中的女生郭雅萍、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为了夫妻。

第五队学生毕业时，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。他利用这批学生，先后在湘北的浏阳、益阳、平江、湘阴等地成立了5个情报队。阮成章、余诚、王子民、肖赞何、刘汉屏、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。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“研究系”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。

1939年，陈诚把原在宜昌附近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商震挤走后，把九战区交给了他的助手薛岳，自己兼任了设在湖南邵阳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（后来到湖北恩施才正式组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）。基于陈诚的一贯家长式作风，六战区的各级干部大都是由长沙九战区调去的。张振国在九战区任第二课课长时，深得陈诚器重。张建议把湘北的情报队成立一个联络组，改属六战区指挥。在得到陈诚批准后，张振国便自兼联络组长，也由湘北转到恩施，联络组便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情报侦察的独立单位。

### “研究系”特务在恩施的发展

恐怖统治下的恩施城 第六战区长官部占据恩施之后，陈诚

企图把湘鄂川地区培植成他的独立王国。在政治上,他主张军政集权,以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,使四川和湖南等受战区辖制的地区的行政、粮政、役政等完全听他的摆布。经济上,在湖北省境内实行计划经济,利用巨额经费调拨粮食、物资,由银行出面经营工厂,设立平价供应处和民享社;经营商业、旅棧及运输业,运用物物交换来进行贸易活动。教育上,在湖北省境内实施计划教育,成立各类专业院校,培育多种人才。在军事上,陈诚彻底执行蒋介石的路线,排除异己,保存实力。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教集权于其控制之下,陈诚便运用情报组织密布在各级机关、部队、学校内部,作为其无形的触角,由上而下、由近及远地贯彻他的意旨。起这个作用的最初是联络组,后来为研究室。

联络组到了恩施以后,为了在陈诚面前多表现,一面搞敌伪和国民党军内部的军事情报,一面加强搜集后方维持治安的防奸、防共、防贪、禁烟禁毒等政治情报。陈诚对这类情报特别重视,动辄就批上“杀!”、“枪决!”、“处决!”等字样。1941年,住在恩施城内西后街58号的秦启安(烟酒税务处主任),就是被研究室非刑逼供屈招为汉奸后,连同与他有关连的10个人,一起被枪毙的。对此陈诚当即就表示“宁可错杀一千、不可纵容一人”。据当时居民反映,在1939年六战区于恩施正式组建至1943年陈诚离开恩施的几年中,几乎每周都有“罪状”出现。

由于陈诚的支持,“研究系”的特务们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。例如进出戒严的警戒线和哨卡时,哨兵只要一听他们说是“长官部”的,就无条件地让他们通行,有时明知他们带有“私货”,但谁也不敢过问,任他们扬长而去。

研究室的特务敢于恃强逞凶,与张振国、阮成章和我的作用是分不开的。张振国经常教育部属的话是:“研究室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,谁要是在外面惹事打架,打输了就不要回来见我!”因此,在

六战区境内，“长官部情报”不要说老百姓害怕，就是六战区的各级官兵也都敬而远之。

有一次，“研究系”特务胡冰华在松滋、枝江一带为非作歹，被专员何绍南拿获。何绍南是以“屠夫”著称的杀人魔王，本想把胡冰华先斩后奏，但投鼠忌器，便先向陈诚请示：“捕冒充长官部情报员胡冰华，招摇撞骗，败坏法纪，请准予就地正法。”这个电报为当地研究室人员侦知后，向张振国告急。由于张振国先走了内线，何的电报没有送陈诚过目，即由秘书室移送研究室核办。研究室立即用陈诚的名义电令何绍南，将人犯移交研究室自行处理。何绍南只好忍气吞声，乖乖地把胡冰华放了出来。胡冰华改名胡小池后，继续在当地活动。后来，研究室用政治人事矛盾，以何“贪污渎职”的政治情报，向陈诚大进谗言，不久陈诚就下令撤了何绍南的专员职务。

1944年，在利川做县长的于国祯，经常化装访求“民隐”。有一次，他利用抬滑杆来掩护身份，不料因他的麻面特征被研究室特务识破。于是研究室的人强迫要坐他的滑杆，于想用抬高乘价来拒绝“顾客”，但特务故意和他为难，他只好勉强抬了他们几十里。后来，这些“研究系”的特务还恶言辱骂他：“你这个麻怪，你不抬老子，老子揍你！你们利川县长是个麻怪，连你这个抬滑杆的也跟着怪了！”并动手打了于国祯一顿才离开。当时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：“于国祯大献苦肉计，特务碰特务，硬抵硬。”

“研究室”与军统之间的勾心斗角 在联络组成立的同时，“军统”特务头子刘培初也打进了六战区，最初还得到了陈诚的信任，让他当上了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队长。党政总队也和联络组一样，事事过问，无恶不作。而且他们之间还争权夺利，经常发生冲突，相互向陈诚控诉对方的劣迹。由于党政总队人多事乱，作恶多端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，研究室也乘机伪造了许多加罪刘

培初的情报,陈诚知晓后,便下令撤销了第六战区党政总队这个组织,“研究系”从此在六战区站稳了脚跟。这也就是张振国和“军统”特务斗争得以自存和发展的一个关键。

“军统”在湖北的老底是“保四科”(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的简称)。“保四科”是“军统”湖北站的原始掩护机构,第六战区成立之时,戴笠也想和在其他战区一样,用“军统”特务控制六战区的情报机构,但陈诚有他自己的特务组织,不让“军统”插足。戴笠对其他战区可以用蒋介石的名义为所欲为,而对陈诚则不敢放肆,因此,六战区内部没有“军统”机构。“军统”湖北站长朱若愚只能在第六战区军法执行总监成立一个调查室,作为他的掩护机构。朱若愚当时对阮成章说:“‘军统’对三个人不敢放肆,一是陈诚,一是胡宗南,还有一个是宋子文,其他没有例外。”因此,陈诚要运用自己的特工去做情报活动,军统不能也不敢过问。事情正是这样,就是蒋介石自己对陈诚,只要陈诚拟计划要编制、要钱、要粮、要物资、要军队,也很少批个“不”字。陈诚能在鄂西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,不是偶然的。军统头目戴笠对陈诚也是以先辈相称,研究室原始应用的一批电台,也大都是戴笠送给陈诚的。张振国也就利用这个关系,拿陈诚做靠山,用学生做爪牙,加上自己钻营活动,把联络组这个暂时性的组织,在1942年用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的正式编制,由军委会的命令肯定下来。

编制从邀功中来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,日军以号称三个师团的兵力先后向湖北远安、宜昌及宜都进攻。本来日军当时的行动属于一种临时“扫荡”性质,而六战区惧于抵抗,则扩大宣传“日军以大军进逼恩施,直指重庆”,让蒋介石多为陈诚送钱、送粮、送装备。当时在对敌的兵力判断上,六战区长官部和蒋介石大本营军令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。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,八十六军的十三师一经接触就仓皇逃走,一直退到罗甫塘和三斗坪。这时

“军统”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，早已闻风后撤，因此军令部对日军行动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。而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，由于没有料到十三师会逃跑得那么快，组长胡祖福及电台人员都没来得及后撤，结果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。因而对日军在宜都、松滋向五峰、长阳进犯的行动，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，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，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。最后论功行赏时，张振国、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“宝鼎”和“总勤”勋章。

张振国邀功自炫，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。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，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。这个情报组织设有主任、副主任（少将或上校级）和4个股（一股主管总务，二股管情报，三股管人事考核，四股管通信）、1个无线电总台、1个巡回教育组；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，分布在宜都、松滋、三斗坪、公安、石首、监利、沔阳、常德、桃源、华容及恩施等地。每组中校以下、准尉以上谍报军官12名，交通兵及摇机兵4名，电台1部；另有19个县站，预想在当地陷敌后继续进行谍报活动。这些县站，编制有站长、副站长及谍报员6名。这19个县站是五峰、长阳、宣恩、来凤、秀山、黔江、巫山、奉节、巴东、秭归、澧县、龙山、资丘、兴山、酉阳、鹤峰、咸丰等。还有若干公开情报机关，如施巴警备部稽查处、万梁警备部稽查处、湖滨警备部稽查处以及由长官部派到前方的第一至第五联络班。这时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，合计内外勤人员300名以上，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。

“研究系”的产生和发展 当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经军委会军令部批准并核发编制的同时，在长官部参谋处还有一个通讯组，它是主管部队通信补给指挥业务的。由于这两个单位仅一字之差，以致彼此业务文电经常混淆。通讯室名义不便对外，阮成章便建

议用“研究室”名义对外行文,作为通讯室的掩护名称,而“研究系”的产生,也就由研究室的成立开始。自此以后,人们都只知道研究室,而不知道研究室实际是通讯室特务机构的代称。

由于研究室在六战区扎了根,为陈诚在湘西、鄂西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坚实的作用,张振国在陈诚左右也就成了“血滴子”一样的人物。1943年陈诚调任中国战区远征军司令长官,就把张振国带去昆明充任了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。张振国并运用陈诚的权势,指派王子民(原六战区研究室督察)充当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。后来陈诚出任军政部长,又把张振国调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调查处长。

在抗战胜利时,他们更以六战区研究室做基础,由阮成章带着主要人员到武汉接收,成立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;原为六战区研究室巡回教育组副组长兼股长的我,则带着一批骨干去北京成立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;张俊球(原六战区研究室股长)也带一部分人员在武汉行辕成立了研究室。在军委会军政部改为国防部之后,张振国又乘机假借陈诚的名义,要国防部二厅收纳研究室的一批人员。并荐派范磊(张振国的同乡至好,十一战区的参议)、杨大和(军政部调查组秘书)充当二厅一司一处处长及副处长。继后,阮成章把武汉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让给他的副手胡孝扬(原六战区研究室副主任、武汉稽查处副处长),自己则充任了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。

1945年至1947年,是“研究系”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。在这段时间里,“研究系”特务势力不仅遍及华中,而且华北、华东、西南以及沿江沿海重要港口,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,也都有他们的踪迹。全国主要城市如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昆明、武汉、广州、青岛、厦门、福州、台北、沙市、宜昌、九江、安庆、镇江等地,都有“研究系”控制的据点。他们在各地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,在全国范围



内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。他们不是军统，不是中统，也不是二厅，也没有一个定型的组织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——研究室。因此，人们把这伙特务叫做“研究系”。

“军统”一向是靠打击别人发展壮大自己的，“研究系”这样的发展趋势，直接影响了他们本身的利益，尤其在大城市的有些机构，都是研究系从“军统”控制中夺过来的。比如武汉稽查处、海军情报处等单位，“军统”是把它当成一块肥肉看待的，落到“研究系”的手中，他们是不甘心的。因此“军统”内部把这些单位当成其工作的“钉子”，随时准备拔掉。正因为这样，“研究系”内部也强调“净白阵营”、“整肃纪纲”，严防“军统”分子渗入。并且采取“应付‘军统’、取好中统、靠拢二厅（二厅厅长侯腾，非军统分子，企图独树一帜）”的做法，哪方面工作有漏洞，就尽可能地加以弥缝。

为了追求表现，“研究系”处处锋芒毕露。首先在昆明由王子明制造成了“李公朴、闻一多事件”，结果全国一致声讨，舆论哗然。“军统”向蒋介石奏明是陈诚“研究系”干的，陈诚无以自解，将张振国痛骂了一顿。接着又发生了武汉大学“六·一惨案”，这是“研究系”控制的武汉稽查处处长胡孝扬一手导演的，结果又引起了轩然大波。“军统”再向蒋介石奏明又是陈诚“研究系”所为，陈诚再一次为之头痛。

其次，由于张振国处处树敌，先是在昆明龙云的三个公子争夺陈佩秋，影响了他本人的声誉；而其在南京和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在京沪报刊发表后，陈诚见到了十分恼怒，表示对张振国“永不录用”。

再次，也由于“研究系”的骨干经不起风吹雨打，见上层失了依靠，便各自心灰意冷，相继转业。各地方机构也站不住脚，云南省稽查处让给了“军统”，武汉也不能不给“军统”拿去，连阮成章的海军情报处也只得松手。